

目

录

小引	员
第一章 中国现代语文课程发展的脉络	猿
第一节 关于“为什么教”的问题——现代语文课程对 教学目标认识的演变	源
第二节 关于“教什么”的问题——现代语文课程对 教学内容认识的发展	员
第二章 中国当代语文课程改革的趋势	圆
第一节 困惑与使命——中国当代语文课程改革的 背景	圆
第二节 改变观念和改革现状——中国当代语文课程 改革的要求	圆
第三节 与生活广泛联系——中国当代语文课程改革的 趋势	猿

第三章 摇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	猿
第一节 摇奇异生态中的规范化要求——语文课程与语文 课程标准	源
第二节 摇语文教材讲究系统组合——语文教材的概念及 其功能	源
第三节 摇对旧式文选型的突破——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的 几个发展阶段	缘
第四节 摇春天里孕育出无限希望——当代中学语文教材的 改革	缘
第四章 摇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结构类型	猿
第一节 摇两条线索和四个系统	猿
第二节 摇系统组合的多向探索	愿
第五章 摇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与使用	怨
第一节 摇重视教学的定向控制——教学目标的确定	怨
第二节 摇众里寻他千百度——范文的选择和加工	员
第三节 摇集中串联和散点分布——语文知识的提取和 编排	员
第四节 摇构筑思维和操作的演练场——语文作业的 设计	员
第五节 摇无声的导游者——导学材料的编写	员
第六节 摇智慧显现于组合的灵巧——教学单元的 合成	员
第七节 摇由静态向动态转化——语文教科书的使用	员

第六章 摇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现代实用文剖视	员园
第一节 摇人事景物的形象再现——现代记叙文剖视	员员
第二节 摇信息的提供和求知欲的满足——现代说明文剖视	员圆
第三节 摇发展理论思维的凭借——现代议论文剖视	员源
第七章 摇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现代文艺文剖视	员圆
第一节 摇两种语文教学实用观——现代文艺文教学的意义和作用	员圆
第二节 摇用真情拨动心灵的弦——现代诗歌剖视	员远
第三节 摇品尝体现个性的人生况味——现代散文剖视	圆范
第四节 摇展现人物性格的画卷——现代小说剖视	圆原
第五节 摇艺术舞台再现浓缩人生——现代戏剧剖视	圆源
第八章 摇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文言诗文剖视	圆苑
第一节 摇历史长卷中的时代风云——文言散文剖视	圆苑
第二节 摇民族精神铸成的文化瑰宝——文言诗歌剖视	圆愿
第九章 摇语文教材中其他品种的编制和使用	圆园
第一节 摇三种思路的优化融合——语文教学指导书的编制和使用	圆园
第二节 摇信息符号的第二次转换和变形——语文视听教材的编制和使用	圆缘
第三节 摇从有限向无限延伸——语文课外辅助教材的编制和使用	猿范

第十章 新世纪语文课程教材建设展望	猿愿
第一节 摇三件基础性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语文课程教材新体系打好基础	猿愿
第二节 摇一项开拓性工程——对国外母语教材内容作 比较研究	猿缘
第三节 摇在继承中求创新——对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 几点设想	猿园
后摇记	猿苑

小摇摇引

二十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封建制度的沉重枷锁，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获得新生，获得长足发展的伟大年代。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体现着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新思想、新教育起着唤醒民众、激励后代、培育新人，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在谋求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征途中，那些卓越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往往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们不仅把教育看作是革命和建设的不可或缺的一翼，同时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各科教材教法等方面都要拨正航向，努力使之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今天，二十世纪的伟大历史已经翻过了最后的一页，“建设要靠科技，科技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跃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战略思想。进一步改革教育、发展教育，正面临着一个最好的机遇。

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民族，一个有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的民族，无不重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教育。这不仅因为本民族的语文反映着本民族的精神、传统、心理和文化积累，而且接受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也必须凭借民族语文这一基本的载体。因此，在中国，当二十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封建王朝衰朽没落的时候，教育普及、国语统一、文字改革几乎与摧毁封建帝制的革命烽火一起，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破旧立新的冲击力。代表着民族觉醒、民族新生的社会力量需要用活的语言、新的文字来取代死的语

言、古老的文字，以便更好地传播和接收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语文和语文教育的改革成了这一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在是势所必然。

教育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教育宗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而当新的教育宗旨一旦确立，新的教育制度一经形成，反映新的教育内容的课程教材建设就成了至关重要的课题。因为教育宗旨要通过课程教材来体现，教育制度的特点又必须通过课程教材鲜明地反映出来。“为什么教”的问题，首先必须在“教什么”中得到落实。语文教育的革新，是以语文本身的革新为前提、为先导，同时以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为核心、为灵魂，而这二者又以课程教材的革新为载体、为渠道。因此，19世纪初期的语文教育革新运动，首先就体现为语文课程教材的新生；19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语文教育革新运动，同样也曾经在语文课程教材的革故鼎新上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今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跃发展，随着新技术革命对人才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民族语文教育的改革也必须以语文课程教材的改革为重要的主攻目标，使之更好地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社会需求。这也就是 20世纪对语文教育发出的热切的呼唤。

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是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的问题，尤其是中学的语文课程教材建设问题。作为研究和探讨的起点，是对中国中学语文课程在当代的发展作一个粗略的回顾。

第一章 中国现代语文课程 发展的脉络

在 20 世纪的最初年代，指导学校教育的法规，有所谓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这是从日本借用的名称。课程纲要，近乎是现在所说的教学计划；课程标准，相当于现在的教学大纲。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严格意义上的语文课程标准是在 1923 年由当时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下属“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讨论制定，并颁布试行的。在此之前，无论是 1902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还是 1912 年的中小学《课程标准》，都因为规定的内容简单笼统，语焉不详，不能算是具有规范作用的标准。所谓课程标准援其完备的形式应该简要地反映该学科“为什么教”（目的）、“教什么”（内容）、“怎样教”（教法）和“最低限度”（程度）等项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实践中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法定文件加以阐述。专家、学者们也得进行研究、讨论和试验。前者，反映国家在一定时期对该学科的性质、任务、教学宗旨和教学目标的确认，它对实践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后者，只是反映个人对该学科有关上述问题的认识和见解，对谁都只有启发、借鉴作用而没有任何约束力。当然，国家制定的文件，也必然要吸收某些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并使之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人均应遵循的认识成果和行动规范；并且，这种认识和规范也必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学科本身认识的日益深化而不断变化和更新。1923 年制定的语文

课程标准正是在新旧教育思潮激烈交锋、教育革新派对语文教学领域各种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的背景之下产生的。本章重点阐述 1904 年学术界围绕“为什么教”和“教什么”两大问题展开的讨论。

第一节 关于“为什么教”的问题 ——现代语文课程对教学目标认识的演变

从课程的角度，对语文学科的教学作宏观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什么教”的问题，即教学目的问题。1904 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作了如下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个教学“要旨”，沿用日本当时为学校语文学科规定的目标，不过，它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而提出，还是为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即：①突破了过去读文只是为了作文的狭隘圈子，使“通解普通语言文字”和“略解高深文字”成为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读和写兼顾了起来；②突破了过去作文必须重复、疏解、发挥圣贤之说的严重桎梏。把“自由发表思想”列为教学的又一重要目的，使语文用来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可能；③突破了过去读文作文只是囿于少数圣经贤传的古典殿堂，让一般意义的“文学”列入教学目的，使之成为“启发智德”的重要媒介。不过，《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规定的这些“宗旨”，写在纸上冠冕堂皇，考察实施情况却不免南辕北辙。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语文学科所学的“语言文字”，还纯粹是古语古文，所谓“普通”与“高深”只不过是近代文言文与古代文言文的区别而已。语言文字如果脱离了现实中人们习用的口头语和白话文，那么

“自由发表思想”云云也就只能是一种理想。至于“兼以启发智德”一说，含义也比较笼统。所以，为了根据当时新的教育思潮，科学地制定出语文学科的课程标准，首先必须对它的教学目的重新加以探讨。

周予同（~~周思~~ 周思），为组织课程标准的讨论，在 1924 年《教育杂志》第 15 卷特发号外专辑。他本人在专辑上发表《新学制的国文课程》一文具体贡献了他的主张。在此之前，他在第 15 卷第 1 号上曾发表《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一文，对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周氏首先肯定：“中学校是普通教育，是大学或专门教育的预备；不是狭义的职业学校，也不是大学的文科。中学生在学问上，是预备升学的；在社会上，是养成一个完全的人。”根据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即：“~~凡~~人人都用国语或浅近的文言，自由而敏捷的发表思想感情，或记述事实，绝对没有文法上的错误。~~凡~~人人能懂得中国文学和学术变迁的大概。”周氏的这一表述有这样一些特点：强调“国语”和“浅近的文言”并重；强调发表的“敏捷”性；强调“文法”知识的正确掌握；强调中国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初步了解。但它也有明显的不足：相对而言，重写轻读，重写轻说；国语或浅近文言，不分主次，并认为中学生也应该会写浅近的文言文；把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掌握同语文工具的掌握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忽视了中学生的品德教育，这是从《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后退了一步。

这里牵涉到四个重要问题：一是培养中学生文言文的写作能力应不应该列入教学目的？二是培养和提高中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应不应该列入教学目的？三是陶冶和锻炼中学生的思想品德应不应该列入教学目的？四是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应当怎样看待？

对于前面三个问题，“五四”以前就在教育界高举革新旗帜

的浙江一师就曾经提出过自己鲜明的主张，他们在自拟的《国文教授法大纲》中规定：“目的员——形式的。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近于现代语——如各日报杂志和各学科教科书所用的文言——所发表作文章，而且能够敏捷、正确、贯通。目的圆——形式的。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目的猿——实质的。使学生了解人生的真义和环境的现状。学校各种科目，无非是一种做人的工具。所以国文科的内容，也应该注重人生和环境，使学生能够了解做人的道理”。浙江一师诸同人的这一表述，确实为历史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①强调用现代语或近于现代语的文言进行阅读，达到敏捷、正确、贯通，是阅读教学的目的。至于写作，则一律用现代语，因此，文言文写作不是教学目的。②现代语的应用，不光是纸上能写，还得要求口里会讲，把口语表达能力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③强调学语文就是学做人，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但这一表述也有缺陷：①忽视文学教育；②忽视文法、修辞等语言教育。

1919年，陈启天在《少年中国》第圆卷第员期上发表《中学的国文问题》，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语文学科教学目的的见解。他把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分为“主目的”和“副目的”。他所悬拟的主目的共三项：一是“要能说普通语言”。即要教会学生用国语流利地说话，“有意而能直接用口道出”，没有语法上的错误。二是“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他认为中学生只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就够了，不必学专门的骈文和古文。此外，中学生还要能看点美术文，如古典诗词，为的是“涵养性情”，启发文学上的兴趣，所以只须“略解粗浅的”，就足够了。三是“要能做现代应用文”。他强调“中学生顶好完全学白话文”，但也指出“浅近文在现在还有一部分的势力——升学和别的需要——不得不兼学浅近文”，所以在写作方面，应以学写现代的白话应用文为主，兼学浅近文言的应用文。陈氏规定的副目

的有两项：一是“要启发思想，锻炼心力”。他认为旧式国文教学，“学生死读先生死讲”，“弄得学生思想闭塞，心力迟钝”，弊害严重，所以他强调“国文教授应该注意促进学生的思考力、观察力、批评力、研究力等，使他们得到求学和作事的无上工具”。二是“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他认为学校中修身、历史、法制、经济等科，“是使学生了解和应付人生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科，“是使学生了解和应付自然的”；地理则“是供给学生人生与自然相关的知识的”；而“国文教授也是帮助这些科学，使学生对于人生和自然了解的程度加深，应付的能力加大”。陈氏的这一表述，其价值主要在于：①将语文学科特有的教学任务，列为主要目的；将语文学科与其他各科共同肩负语文学科又有其特殊功能的任务，列为副目的。这样就把语文学科的多种教育教学任务，分清了主次，鲜明显示出其间的区别和联系。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学生智力（心力）、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任务。③把普通话的口语表达和现代应用文的读写能力，提到了十分显著的重要地位。④注意到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但是，从陈氏的表述中，我们也分明地看出，他在强调应用文的同时，多少忽视了文学教育的因素。

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进行教学改革的孙俚工，是 1909 年代初提倡白话文和文艺文教学的激进派人物，他在 1909 年提出了他们这一派人物所拟制的语文学科教学目的，共三项：“（员）人人有迅速阅看国语书报的能力，以启发思想；并且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圆）人人有精密鉴赏国语文艺的能力，以培养美的感情；并且了解彼底变迁和性质。（猿）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地明确地敏捷地发表情思，记叙事物。”孙氏的这一表述，显然吸纳了当时革新派的一些较有价值的观点，如语文能力培养和思想教育、美感教育的结合，重视文学的变迁和性质的了解，强调发表的敏捷性等等。但这一表述的独特之处也十分明显，即强调言文一致，把国语的教学和普及列为新时代语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之一；强调

国语文艺的鉴赏，把现代新文艺的教学列为教学目的。正如孙氏所一再申述的：“我们为赏鉴文艺而注重文艺，为稳固白话文底基础而注重文艺，为调剂生活而注重文艺”，他把中学语文学科中加强新文艺教育看做是巩固和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历史成果的重要战略步骤来看待。他的这种见解，尽管因为无视中国古代优秀文学精品而显出某种偏颇，但在面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时时都有卷土重来危险的当时，还是富有锋芒的卓越见识。

新学制的语文课程标准，正是在这样的讨论基础上制定的。当时主持此项工作的是胡适，具体草拟课程标准草案的，初中段为叶绍钧，高中段国语科为冯顺伯，高中段国文科为穆济波。关于教学目的，~~1924~~1922年《课程纲要》中作了如下表述：初级中学——养成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养成看平易古书的能力；能使学生作文法通顺的文字；引起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高级中学——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这一表达无疑是以胡适的主张为蓝本的，它同~~1924~~1922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相比，确实前进了一大步。首先，它分初中、高中两段来制定教学目的，显出了两个不同阶段在教学目的上的区别和联系，既反映了教学的阶段性，也反映了教学的连续往，使教学的循序渐进有了依据。其次，它肯定了语体文读写训练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突出地位，使“自由发表思想”有了保证。此外，从初中到高中，它都强调了文学教育因素，既重视现代新文学，也重视古代旧文学；还对文法给予一定的地位。而且，从现代教育观点来看，上述教学目的专注于语文能力的培养而不强调语文知识的灌输，也是一大进步。然而，它毕竟还有缺陷：一是初中要求学生会“看平易的古书”，高中要求学生“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初高中都要学作文言文，在文言文教学方面提出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二是完全漠视了语文学科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和发展学生智力方面的作用。对上述缺陷，就连穆济波本人也曾于事后激

烈加以抨击，认为这个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教学目的，将“教”与“育”分离，将读古书列为要旨，是重大错误，“此种错误，若不加以修正，将来影响于中等国文教学前途，其为害正不可细计”。穆氏认为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概言之，就是一句话：“养成有思想、有作为、有修养，在中等教育范围以内，有充分使用本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少年。”穆氏是 1949 年代东南大学附中国文教学改革实验的主力之一，他的主张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1949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这是以政府教育部名义颁行的、具有法规性质的第一个体例较为严整、内容较为周详的课程标准。其中语文学科的初中部分，由孟宪承、刘大白等人草拟，高中部分由孟宪承和胡适草拟。这一个课程标准的基本项目和内容要点，大致沿袭 1936 年《纲要》；但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某些痕迹。其中规定的中学语文学科教学目的是：初级中学——养成运用语体文及语言充畅地叙说事理及表达情意的技能；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书报的能力；养成阅读书报的习惯和欣赏文艺的兴趣。高级中学——继续养成学生运用语体文正确周密隽妙地叙说事理及表情达意的能力，并依据学生的资性及兴趣，酌量兼使有运用文言作文的能力；继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的能力；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这一表述，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它确认中学语文学科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以提高用语体文来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能力为主要目的；至于用文言作文的能力，不作普遍要求，只依学生的资性及兴趣，酌情予以培养。这是对坚决反对中学生学写文言文的新派人物的某种让步，从时代发展的趋势看，无疑是认识上的进步。其次，它把“语言”能力（即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培养和提高，首次明确列入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在过去，说话的训练只有在小学语文学科中有人提出并实行过，如叶圣陶。在中学语文学科中，胡适提出过，陈启天提出过，浙江一师的同人也提出过，但都属一家之言。现在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文件上这样明确规定，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再次，它在阅读方面提

出了“了解平易的文言书报”和“养成阅读书报的习惯”的要求，把范围从1924年《纲要》的拘囿同于“古书”扩大到一般书报，重心移到了实用方面，而且把目标从过去局限于“能力”发展到“养成习惯”，注意了学生智能的培养。这些都是前进的迹象。只是阅读的对象仍着重在文言文，仿佛现代语体文并无阅读与欣赏的价值，这种偏见并未根除。这同孟宪承（1890~1952）当时所持的观点有关。孟氏在评论叶圣陶所编的初中国语课本时曾说：“我则以为在初中里，除文典主要讲通语法文法，示例应当并重；与补充读物，当然语文并行外，其文学读本教材，应当以纯粹的中国文言文学为主体，语体文不必选，翻译文更不必选”。他认为文艺界尽管可以倡导白话文学，但“决没有因为文艺界盛唱一种思潮，便令全国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学生，不能尽量享受固有的粹美的文学遗产之理”^①。孟氏既认为只有古代文言作品才是“粹美的文学”，那么谈阅读当然只局限于读“文言书报”，读文言的文学作品了。这种观点，在旧中国的语文教育界占有相当的势力，其在国统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诞生的前夕。

在“官方”文件中，1959年《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的基本格局几乎成了新中国建立前各个时期同类文件的一个模式，纵有修订，也无关宏旨。但在“民间”，各派观点的论争则始终存在。在教学目的问题上，坚持复古的和坚持革新的，重在鉴赏的和重在实用的，强调语言的和强调文学的，主张文白兼顾、不分轻重的和主张文白兼顾、须有侧重的，标榜内容第一的和标榜技术第一的，如此等等，众说纷纭。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里，在语文学科教学的目的问题上，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解决得比较圆满。综上所述，从1920年代开始，围绕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在教学目的这个根本问题上，人们的认识经历着一个曲折迂回而又不断接近完善的历史过程。回顾这一过程，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讨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和任务，以期得出既符合国情又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的结论，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援

^① 见《初中国文教材平议》，《教育与人生》1934年第1期。

第二节 关于“教什么”的问题

——现代语文课程对教学内容认识的发展

1904年围绕语文课程标准展开讨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教什么”，即教学内容问题。“教什么”同“为什么教”有密切联系，教学内容直接受制于教学目的，所以讨论教学内容问题实际上是讨论教学目的问题的深化和具体化。

从制定课程标准的要求来说，所谓教学内容主要指如下两项：一是课程设置（或叫学目设置、学程设置），二是教材大纲（或叫教材支配）。

1904年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教学内容共四项：记事实文；说理文；章奏传记诸体文；词赋诗歌诸体文。当时实行四年制，顺次学来，每年一项。这样的教学内容与“词章”的学科名称是适应的，只是表述得非常简略。1905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学科名称改“词章”为“中国文学”，学制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其教学内容规定为读文、作文、习字以及有关“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等文学史知识。具体安排如下表：

学年	程	每星期钟点
一	读文摇作文摇相间习楷书行书	源
二	读文摇作文摇相间习楷书行书	源
三	读文摇作文摇相间习楷书行书兼习小篆	缘
四	读文摇作文摇相间习楷书行书兼习小篆	猿
五	读文摇作文摇兼讲中国历代文章名家大略	猿

学目设置已初具规模。兼讲中国历代文章名家大略，已涉及文学史的知识，是新增内容，并为“中国文学”一科所必需。

1905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四年制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作了这样的规定：“国文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

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①1904年又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其中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列表如下：

第摇一摇学摇年		第摇二摇学摇年	
周时	教 学 内 容	周时	教 学 内 容
苑	讲读摇作文 习字 { 楷书 行书	男 苑 女 远	讲读摇作文 文字源流 习字同前学年
第摇三摇学摇年		第摇四摇学摇年	
周时	教 学 内 容	周时	教 学 内 容
缘	讲读摇作文 文法要略 习字同前学年	缘	讲读摇作文 文法要略 中国文学史 习字 { 行书 草书

与奏定《章程》相比，增加了文字源流、文法要略两个学目，习字训练中减去小篆，增添草书，开始重视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而且内容渐倾向于实用。语文学科的周学时，男女有别，第二学年男 苑 女 远，是为新例。

“五四”前后，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呼声日高，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目的的认识也有所发展，于是针对 1904 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的教学内容展开了讨论。首先是课程设置问题。周予同在 1954 年曾撰文指出：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学目共六项，即讲读、作文、习字、文字源流、文法要略、中国文学史，其中有三项可以不必列入。即：习字、文字源流和文学史。关于习字，周氏说：“习字的意义有两层：一为应用的，一为美术的。就应用方面说，我以为习字的任务应该让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去负担，决不